



#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有新招

■ 张懿玮 高维和

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转型面临多重压力,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对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城市消费创造能力不足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已成为居民消费的主战场。优质的城市服务不仅是城市的基本功能,而且是创造居民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动力。本质上,消费取决于市场是否能够提供丰富的、值得购买的产品以及消费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因此,如果没有繁荣的生活服务作支撑,没有完善的公共服务作保障,居民消费将难以有质的飞跃,强大的国内市场也难以形成。

当前,我国城市服务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仍然偏低,而且近年来支出增长有所放缓。

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4万元,只增长5.9%,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高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样增长放缓。

同时,国内市场还面临消费外流的窘境。据联合国世界旅游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出国旅游花费达到2577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究其根源,主要是国内市场缺乏足够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城市服务的消费创造能力仍显不足。

以上海为例,落户的顶级品牌并未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品和价格优势。作为中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上依旧面临诸多挑战,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第二,公共服务的消费保障能力偏弱。

优质的公共服务能够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有助于解决后顾之忧,从而有力促进居民的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然而,当前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还是不够完善,对消费的保障能力仍然薄弱。特别是,居住负担、医疗和教育支出或多或少限制了居民的自由支配收入和其他消费支出。

以居住支出为例,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居民的这项开支分别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48%、23.24%、16.54%、22.22%以及人均消费支出的32.85%、34.45%、22.55%、30.74%。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必须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百姓的消费负担,使人们想消费、愿消费、有能力消费。

## 开拓新亮点以刺激新需求

日前,国家十部委联合发布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体来看,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新招”:

一是以卓越的服务型城市为发展理念,营造居民消费新环境。

促进居民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需要不断改善消费环境,创造令人更加满意的国内消费体验。服务型城市是以服务经济为支撑,以服务型政府为保障,通过发达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供给、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包容的文化服务氛围,实现企业、居民和游客满意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

区别于文化型城市、生态型城市、创意型城市、旅游型城市等偏重于城市本身的发展模型,服务型城市更多关注人的需求和发展。它以服务作为城市的发展本质,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目标,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发达的服务业和包容的文化服务氛围创造优质的消费环境,最终形成在消费经济引领下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二是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发展保

障,树立居民消费新信心。

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做好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基础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减轻人们的生活负担,以此来保障消费需求的供给循环系统有效运转。

为此,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逐步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持续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加大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积极推进住房改革,加大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抑制房产泡沫,释放被房价抑制的消费需求;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完善相关细节,解决居民申报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切实减轻居民的税收负担。

三是**以不竭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发展根本,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就商业繁荣而言,除了需要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之外,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型产品和服务以刺激产生新的消费需求。为此,有必要着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以“负面清单”为主的管理模式,破除不合理的限制,全面激发市场活力。要以包容审慎的原则对待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和新服务。包容就是要充分看到新事物对社会和百姓带来的益处,审慎就是要充分评估可能产生的风险,认清发展底线。在包容审慎的原则下制定新的管理办法,而不是一上来就管死。各地方、各部门尤为要顺势而为,不要仍用“老办法”去管制“新业态”。

同时,要积极打造各类创新平台,加强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姻,推进创新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对接,促进国内外创新创业人才的积聚,进而提升新品开发和进入市场的效率。

四是**以优质的文旅服务为发展重点,打造一批强大的国内旅游和消费新中心。**

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文旅产业在刺激消费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

的重要增长点。

要持续加强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和剧院等文化场馆建设,激发现有文化场馆的活力,打造一批满足居民和游客需求的高品质文化观光体验项目、演艺项目。同时,积极推进场馆与购物、休闲和旅游场所的跨界合作。

要大力推进旅游购物发展,打造中高端消费载体。可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为试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优势,打造若干高端品牌商业区,在产品种类和价格上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出国旅游购物消费回流。

要积极开发夜市和夜间休闲游乐项目,繁荣夜间经济,提升城市夜间消费的供给能力。同时,引导人们转变消费观念,充分利用各类平台激发人们的旅游和消费需求。

五是**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发展方向,引爆消费经济新亮点。**

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需要创造全新的消费需求。在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酝酿形成的大背景下,应以新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开拓消费经济新亮点。

要有意识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对技术成果的落实转化。在这方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要能够站在技术的制高点。要加强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公共服务业的融合,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加强与商业、金融、教育、医疗、文旅等服务业的融合,加强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培育形成一批互联网+、人工智能+、旅游+、休闲+的新业态。

此外,要积极应对互联网对实体店销售的影响,改造传统商业中心,加快推进新零售建设,加强体验消费,打造实体店消费新模式,成为人们打卡消费的新选择。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

# 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关,也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密切相关,还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优化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战略手段。

在商务部明确提出开展建设试点之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迅速得到响应。其中,反应最快的要数重庆和南京。1月24日,仅在商务部提出拟开展试点工作一周后,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推进消费平台转型升级,壮大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南京市两会上,“争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这些城市为什么如此积极?里面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对重庆而言,尽管目前经济总量已突破2万亿元大关,但正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近两年GDP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特别是,2018年实际增速为6%,与几年

前的最高峰值相比差不多缩水一半。重庆抢先布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借消费升级提振经济发展的意图相当明显。对南京而言,可能主要是为了圆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梦。如果进展顺利,也算是一种自我期许的满足。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提出的新战略概念,在理论研究、政策机制和战略规划等方面也没有成熟、系统的参照。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找准发力点十分必要。

要充分认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统计表明,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同比回落1.2个百分点,以高质量的供给催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变得更加紧迫。从城市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后工业时代,消费经济正在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消费生活方式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流,布局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是在新型城镇化领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的重大举措,可以起到开辟主战场、建设主平台、打造主引擎的重要作用。

要积极借鉴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经验和模式。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全国的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已有45个。截至2018年6月,试点城市共有4亿人次参与试点工作,累计拉动文化消费约1100亿元。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是目前在部委层面推出的两大消费城市战略,前者主要涉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对相关领域行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后者重在落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包含文化消费的相关内容。深入研究和促进这两个试点并建立良性互动的协调、协作关系,不仅有助于做大我国消费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而且有益于提升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实施效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 乡村振兴不能“撒胡椒面”

■ 李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风高浪急,加快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显得更加紧迫,对增强抗击国际贸易压力、加紧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 农村服务体系有待健全

当前,乡村发展的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而且在外定居的比例不断提高。部分乡村常年在外务工青壮年比例超过90%,呈现“空心化”现象。总的来看,外流数量始终超过返乡数量。

第二,土地等生产资料闲置化加重。调研显示,土地撂荒现象在全国农村有蔓延趋势。这与交通条件和务工机会、自然条件的优劣以及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有正相关关系。同时,土地临时租赁现象也值得关注。

第三,农业收入提高渠道不畅。研究显示,农业收入来源传统,收入结构单一,收入渠道不畅、农产品价格偏低,依然制约了农业和农民的持续增收。综合来看,广大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非农业领域,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拉大。

第四,乡村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相关挑战包括乡村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的虚化弱化、农村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

第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一方面,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缺乏足够的对口资

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说:“土地流转不了,乡村就振兴不了。”农村土地闲置标志转变农业传统生产方式的时机已经到来。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如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也是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的重要载体

金,传统村落缺乏维护和改造资金;另一方面,乡村医疗、教育、文化、居住、商品、通信等公共服务与城市的差距仍然较大。

由此,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以下几个困难:土地流转有待规范。土地流转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说:“土地流转不了,乡村就振兴不了。”目前,土地流转的规模和规范存在一些问题,如土地流转交易的市场及机制不够健全,风险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土地承包者的利益保障有待提高,农民认知程度较低等。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待健全。具体表现为:亟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机站、农技站等基层农业服务保障机构需要进一步激活,农产品的监管和检测体系有待加强。

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瓶颈有待破解。先进的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并与农村资源实现有机融合,是整合农村要素资源,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为返乡劳动力配套产业资本。

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有待加强。在这方面,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推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生产方式变革。

## 引导“城市资源下乡”

乡村振兴影响深远,牵涉面广,难度很高,需要抓住关键、聚力突破,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为重点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避免乡村振兴演变成“广撒胡椒面”的普惠式补贴。

一是通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村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是振兴乡村的首要任务。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扭曲的价格体系,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挤向城市,从而导致乡村衰败、治理失控。振兴乡村需要围绕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这一核心,探索小农经济如何向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二是通过改变“小、散、旧、单”的生产组织和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手段,推进新型农业生产方式。

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农村土地闲置标志转变农业传统生产方式的时机已经到来。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如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也是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的重要载体。

三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融合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大力推进“农旅结合”和“农超结合”等模式创新,发展“大户+合作社+农户”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

四是以“城市资源下乡”作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

应研究制定专门的激励措施,引导城市人、财、物、技术、文化等各种资源下乡,并与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结合融合,促进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升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科创板注册制改革 对法院提出更高要求

■ 肖凯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顶层设计。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科创板注册制具有鲜明的法律变革特点,对金融司法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提供优质司法产品,积极回应科创板注册制司法需求。考虑到科创板注册制试点工作的专业性、前沿性,有必要打破审判团队局限,探索建立跨业务庭的新型专门审判团队,提升司法裁判对资本市场的规则引领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回应性金融审判机制。

其次,探索完善与注册制相适应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域外成熟资本市场的证券法实施机制,通常采取的是公力实施和私力实施的双轨并行,共同形成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公力实施是证券监管机构等公权力部门的执法行为,往往涉及证券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追究;私力实施则是普通投资者诸诉司法途径,寻求证券侵权行为中的民事赔偿。

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定价发行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对于投资者而言,私力实施更能体现损失填补。为此,金融法院应树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审判理念,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证券纠纷民事赔偿的司法认定标准;针对证券群体性诉讼的特点,构建和完善以示范判决机制为中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发挥投资者保护公益性机构、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的作用,提升调解的案件分流效果,降低投资人诉讼成本,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最后,推动构建涉科创板上市公司纠纷的集中管辖。积极探索和推动涉科创板上市公司纠纷,尤其是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统一于上海金融法院集中管辖。

主要的考虑在于:一方面,符合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目的,也能够充分利用上海金融法院的高质量司法资源,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另一方面,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稳妥推进科创板注册制试点工作。由于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市场的“试验田”,相关规则的内涵和边界都有待厘清,在发行上市、上市公司监管、市场交易等基础性改革中还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纠纷,需要通过集中管辖,以及及时明确新型争议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的司法认定标准,协调监管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的一致性,维护资本市场的法治秩序。

总之,服务保障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既是上海金融法院的重大职责使命,也是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要用“可预期”来“稳预期”,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各类企业在上海专心创业、专注发展;要以改革保障改革、以创新推动创新,充分发挥金融审判职能,真正为科创板注册制的顺利推行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为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教授)

# 贿赂犯罪花样翻新 给刑事立法带来挑战

■ 李振林

一段时间以来,新的刑法规避行为不断翻新,给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造成了极大挑战。刑法规避是指自然人或单位为逃避刑事制裁,通过改变或制造某种与定罪相关的事实,从而获得无罪或轻罪处理结果的行为。大体而言,贿赂犯罪中的刑法规避现象包含三种情形:

一是行为方式的规避。

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受贿案中,除部分开发商就具体请托事项以一事一报方式酬以重金外,还有50多名开发商未明确具体请托事项而长期以礼金形式送出钱物。这是刻意规避“受贿—谋利”的权钱交易行为。

二是犯罪所得的规避。

例如,近年来争议颇大的性贿赂,即涉及规避刑法对贿赂犯罪所得界定的话题。权色交易本质上与权钱交易一样,但按照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性贿赂并不属于“财物”,也不属于“财产性利益”,这就为利用美色实施贿赂犯罪的人提供了刑法规避的机会。

三是行为结构的规避。

例如,行贿人将行贿款以项目开拓费等名义交由中介公司代为办理,以期规避法律风险。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将行贿款外包给所谓的合作伙伴,以第三方的“挡箭”来换取雇主的“干净之身”,并最终让消费者为贿赂买单,这种通过改变贿赂行为结构的方式,往往导致司法机关难以查处。

这三类贿赂犯罪的刑法规避行为,仅仅是实践中各式各样刑法规避行为的一部分。从严密刑事法学的角度出发,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刑事立法进行完善。

扩大贿赂犯罪的范围。贿赂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于破坏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根本形式在于“权—利”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种类繁多,包括性贿赂在内的非财产性利益同样符合贿赂犯罪的本质,将贿赂扩大为“不正当利益”实为时势所需。

同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界定为“不正当好处”,这里的“不正当好处”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及非财产性利益。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既是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也顺应了国内需求和国际潮流。

取消贿赂犯罪牟利要件。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几乎没有国家为行贿罪、受贿罪设置相关牟利要件。事实上,只要受贿人索取或者接受了不正当好处,便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无须考虑是否谋取利益。

前移预防行贿犯罪的防线。可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国家的通常做法,将行贿罪行为明确划分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和实际给予三种行为方式,并规定实施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均构成行贿犯罪的既遂。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

# 既是党的诞生地 也是红色文化源头

■ 高福进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近一个世纪以来,红色文化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底色,是鲜明的城市标识。上海的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气息,也具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红色文化纪念地的认定从600多处增至1000多处,极大地丰富了红色文化基因图谱。上海的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与海派文化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分不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上海的红色文化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上海文化更加多元,彰显独特的城市精神,有助于上海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圈。

红色文化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在全球文化杂糅的时代背景下,它不仅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有必要参与全球文化的互动交流。一方面,红色文化作为软实力,承担着抵抗外来文化入侵的重任。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内化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价值和道德感召,有助于抵御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因此,我们有责任利用好足红色文化资源,擦亮红色文化这个上海的城市品牌,并积极发挥红色文化的社会效益。比如,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史的遗址遗迹颇为丰富,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其中,黄浦区有125处,静安区101处,虹口区92处,杨浦区83处。这些遗址遗迹不仅数量多而且分量重,保护级别高,都应该好好珍惜和利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思 想 茶 座